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3~40

2013年8月1日

阿道夫·希特勒

休·特雷弗·罗珀¹

1941年6月22日，未经事先警告，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德军突然冲过边界向他的盟友苏联发动了猛攻。这是他毕生事业的关键时刻。这场对苏战争，他等了已经很久，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一再向后推迟，现在纵然仍旧带有风险，但确已到了不能再拖延的时候了。他想：如果赢得了这场战争，就能给他的“欧洲新秩序”带来稳定，意义重大，自不待言，也是任何其他措施都无法比拟的；要是失败了呢，那在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他的狂妄野心的最后、最彻底的毁灭，这也是任何其他因素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在希特勒的全部政治生涯中有哪个时候可以被看做是他一生中最紧要的关头的話，那么确确实实就是发动对苏战争的此

¹ [美]华莱士·布劳克威主编，张焱、金嘉辛、高新祥译：《关键时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86~308页；原书加着重号处，用黑体字标示。

时此刻了。

在他的一生中也有过其他一些重要时刻，这些时刻，他不是从事冒险赌博，就是发动手段高明的政变，诸如：1933 年的攫权上台；1934 年 6 月清除罗姆及清洗冲锋队；1936 年占领莱茵非军事区；1938 年吞并奥地利；以及后来的慕尼黑危机，进攻波兰，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次要的危机。这些危机中有哪一次失败了，诚然也可以为希特勒的事业带来毁灭，但成功了，却未必就一劳永逸；因为这对通向“新秩序”的道路而言，只不过相当于又拐了一次弯，又走过了一个里程碑而已。但是入侵俄国就大大地不同；这是最重大的一项决定，是全部事业的顶峰，是新时期的肇始。要是希特勒在这场孤注一掷中真的成功了，那么后来的一切决定在他眼里都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日常事务而已。真的，就像六个月后，他继他的盟友日本人之后对美国宣了战，那也只能算作日常事务，如同一项条约到期了要展期或是不展期这样简单。可以说，要是他被打败了，以后一切的决定就都变成了只具有招架的性质。他的哲学是从来不留余地，一经决定，要么吃掉别人，要么自己完蛋。

但在详细谈这个问题之前，请先让我申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因为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实如此，不同意见早就有了。他们说，希特勒的本意是要同西方打仗的，他之所以对苏宣战，目的是要打破西方对德国的封锁；他们又说，希特勒对苏开战，事实上是与整个战略无关的，可能只是对西方认真搏斗中一次不期而遇的、战术性的行动，这就是，迅速打下东方后，可以得到新的人力、物力补给，再去全力攻下西方。换句话说，1941 年发动的对苏战争并不是希特勒根本性的政治目的，而 1939 年缔结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你如果指出，希特勒于 1941 年对苏宣战时，是他自己说这是他一

生中最关键性的时刻，也是现代史上的关键时刻时，就会有批评家回答说：在那种情况下，他要不那样说才怪呢！在此之前，在对法国宣战时，他难道没有说过攻打法国乃是决定性的斗争吗？在此稍后，在对美国宣战时不是也说过这是决定性的斗争吗？事实上，希特勒不可能有那么多可以变来变去的哲学，以便可以按照他的彻底的机会主义政策的需要，不时地、一套又一套地拿出来在他的听众面前表演。我不认为这些理论中有任何一套是算数的；我不认为希特勒真要打击的目标是西方，或者他真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我认为这些说法也不能遽然斥之为无稽妄谈，要先加以检验，然后再予排斥。

现在，先得承认，希特勒在不同的时候，说话可以有不同的调子。证据表明，他的话的价值是，过了些时间与事实一对照，往往正好相反。其结果是什么也不能相信。为什么？仅仅因为这话希特勒曾讲过。另一方面，他也难免要受通常的或然率的支配，有时又不幸而言中，因此我们也不能把他所有的话统统斥之为假话。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根选择的标尺，我相信这根标尺是找得到的。我认为，希特勒的有关政策和哲学的声明、讲话，凡在下述情况下讲的都是可信的：假定不但说这些话时的战术环境是可以解释的，而且跟他经常、甚至是处逆境下所表白的总的人生哲学以及可以观察到的他的长期实际准备这两方面都是一致的。现在，如若用这把尺子一衡量，我相信，你就可以发现，希特勒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的什么哲学，什么计划，都只不过是——一时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只有征服东方的哲学与计划，才是他一生的永久信息与终极目标。

试以对待法国为例。1923年，在他写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简单明了地宣布“法国应当被消灭掉”，以后又说过好多遍；这句话对他希特勒来说，已成了老生常谈了。但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把这

句话写进他的书里去的呢？1923 年法国统治着欧洲；依靠它的东欧盟邦——小协约国，² 它不仅在西边而且从东边包围了德国，使之不能向外进行任何扩张。正如戈林 1937 年对美国大使所说的那样：“德法之间摩擦的唯一原因是法国奉行了在东欧建立联盟阻止德国取得它的合法权利的政策。”一旦这种结盟关系被打破，希特勒就放松了对法国的压力；因为到这时他已转向东方，法国只不过是他的后方一块不太讨人喜欢的地方而已。情况就是如此。1940 年他虽占领了法国，可也没有“消灭”它，而是把它当成了一颗卫星国，没有当成德国的牺牲品。

再以对待英国为例，情况也有类似之处。1940 年，当他打算把西班牙视作同谋拉进地中海战役时，希特勒确实把英国说成是最后的敌人，把大英帝国说成是最后一块应当瓜分掉的战利品。他对前来访问的西班牙外长说：“欧非大陆”应成为一个新的大陆单元，由拉丁语系国家实行某种程度的共同统治。没过几天，为了麻痹俄国，希特勒又在莫洛托夫眼前摇晃着这一块大诱饵的另一部分。“打下英国之后，”他说道，“大英帝国在各地的四千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就成了破产后待分配的地产……所有那些对这些地产可能有兴趣的国家应当停止争吵，集中精力讨论怎么瓜分大英帝国。”他要莫洛托夫相信，德国的野心只是在中非一处，也就是“前德国非洲殖民地”那一地区。俄国人对印度不是挺有兴趣的吗？次年，德国军入侵的不是非洲而是俄国，希特勒很自然地向着墨索里尼和德国海军司令部——两者都被他的掉头转向搞得吃惊不小——解释说，此举乃是打败真正的敌人即英国的最迅捷的办法。但这一切都可看做是特殊场合的特殊言论。有什么证据能表明，希特勒真有什么长远的征服和瓜分大英帝国的计划，又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为达到此目的想到怎么干和成立了什么机构准备去付诸实行呢？

² 指在 1921~1938 年期间结盟的东欧捷、南、罗三国。

答案是，什么也没有。希特勒终其一生——说以上这些话的时候除外——始终认为英国在他的计划里位置无关紧要。这也并不是说他完全不把英国当作一回事，因为还是存在着英国在他与这些计划之间插进一手的危险的。但是他经常指望，英国能够被说服，被吓倒，从而不来干涉他。英国充当海上帝国不就满意了吗？希特勒是准备“保证”这个帝国的利益的。他问道，英国在东欧有什么利害关系呢？在那里积极插手又有何目的？在《我的奋斗》中，还有在1925年写成、后来丢失了的有关外交政策的那本书中，希特勒都有过与英国结盟的梦想，以为这样一来，就可抵消法国的抗衡，使德国东进成为可能。1939年与西方爆发战争是由英国首先宣战的，希特勒倒是情愿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来自后方的无谓牵制。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表示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后来又经常重申这种意愿。他总是说，英国与德国是可以和平共存的两个国家。就希特勒而言，1939年与西方开战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

此外，希特勒虽然有时也大谈如何瓜分大英帝国，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为此制订过什么具体的计划。如同俾斯麦一样，他也并不重视殖民地。1923年他说道，德国皇帝的大臣们真是既犯罪又愚蠢，“不去制订在欧洲进行领土扩张的政策，”而去追逐海外殖民地那种海市蜃楼。1937年他又说道：“我们决不照搬自由资本主义依靠剥削海外殖民地致富那种政策。”如果说，事实上他也有过向英国索取殖民地这类事情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找找麻烦——如同俾斯麦那样，准备以放弃这些要求为交换取得某些报酬而已。我们徒然作了一番努力，始终没有找到希特勒曾经认认真真研究过英国问题的证据。希特勒对英国问题的看法简直如同孩子般地荒谬。纳粹党竟没有一个分支机构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希特勒对大英帝国甚至没有兴趣。他既然不需要它，那就准备（以一定的代价）让它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吧！要是英国真的逼他打，那就把这块不

想吃的肉扔给爪牙们拉倒。

可希特勒对俄国的态度是多么地两样呀！自然，有过一段相互一致的时间，那是在 1939~1941 年期间，但那是一种不情愿的、相互间极不忠诚的一致。当希特勒后来终于放弃了这种他感到厌烦的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是如此地违背“我全部过去、我的理想以及我先前的义务”——时，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在波兰亡国的尸体上和俄国签订协议，在德国有一段可敬的历史，但这始终是军方、王公贵族和普鲁士人的政策，从来不是德国南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而希特勒却正是出身于南方的这个阶层的。按前者的政策，必须恢复旧帝国的疆界，即 1914 年的疆界，而且就以此为满足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斥之为“政治上荒谬绝伦，后果又是罪恶滔天”。1943 年他宣布“我对旧帝国的疆界一点也不感兴趣”，“恢复战前的德国不值得我们搞这场革命”。所以，除了在 1939~1941 年期间因策略需要而外，希特勒对德苏和好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他经常提到的是，德国应越过那些可笑的、偶然的、王朝时代订下的边界，以征服俄国并把俄国西部殖民化：那里应是德国的“殖民地”，那里有着德国人的“生存空间”。不仅在胜利的年代，也就是在 1941~1942 年，那时看来征服俄国有可能成功，他宣扬这种学说；而且早在 1920 年，在德国还是一个战败国并被别人宰割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过。后来他又与残酷的凡尔赛和约相比较，公开赞扬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的“无限仁慈”；利用这项条约，德国攫取了俄国几个最富庶的省份。1923 年在巴伐利亚监狱中，他又这么说过；那时候，德国的共产党人已接近把德国变成俄国的一个行省。在俄国人冲进柏林废墟，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自杀之前，在他的向世界最后告别辞中，他还是把以上的理论复述了一遍。如果希特勒征服俄国，把俄国变成殖民地的计划，并不代表 1941 年临时的、权宜之计的宣言，

而是他整个哲学的一项经常性内容，那么从他的第三帝国的实际常设机构来看，其他一些偶然性政策宣言就不是这样。当希特勒接受英国的宣战书时，或者草率地对美国宣战时，他都没有为征服或处置这些国家制订过明确的计划，设立过专门性机构；唯独为了征服俄国，他不但建立了一支大军，制订了专门的政策，并且还成立了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精锐部队：党卫军。

对我们生活在西方的人来说，党卫军看来只不过是一批格外残暴的警察罢了，这种残暴的基础和目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越对党卫军这个组织及其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个人性格进行深入研究，便越发感觉到党卫军不但在国内是进行高压统治的机器，而且在国外也是负有把新的德意志帝国扩展到乌拉尔并要在那里扎下根来的特殊使命的一支特种部队。党卫军实际上就是希特勒的十字军，像中古时代条顿骑士团那样带宗教性质的团体。希姆莱本人，这位神秘的东进的鼓吹者也被希特勒誉之为“我们的依格内修斯·洛约拉”。³ 正是对希姆莱，他指示说：党卫军远不止是一批硬汉，而且要成为“一群忠于理想，至死不渝者的特别组织。”他们所要忠于的理想，就是把德意志帝国推进到东方。为此目的，党卫军众多的部门都按殖民地需要设立了：生命源泉部主管安排有生殖力的人作为供应殖民分子的来源；还有种族与居留局；而党卫军的“文化”部门则搜集德国过去殖民的历史证据以说明今日照做的有理。党卫军这种十字军的性质连希特勒的政敌也看出来。一位保守的反对派人士乌里希·冯·哈塞尔在日记里写道：在党卫军的机体中，潜藏着两种精神的奇怪混合：一方面是理想主义，对国外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和国内党内官僚贪污腐化行为的不满；另一方面有

³ 依格内修斯·洛约拉 (Ignatius de Loyola, 1491~1556 年) — 西班牙教士，耶稣会的创立人。

着一种宗派的野蛮性，这种野蛮性是和它的东方使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希特勒对西方的战争，相对而言，是一种绅士风度的战争：有关战争的国际公法和公约都是得到遵守的。但是在东线的战争，他始终主张应当是另一回事，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一场毁灭战。在德国军队背后，有着一支高级的、独立的、不受总参谋部控制而只对希姆莱负责的毁灭力量，即党卫军。我们所看到的党卫军在（捷克）利迪策村和（法国）奥拉多尔~絮格兰村令人颤抖的暴行，只不过是东线意识形态战中的惯常做法在西线“绅士”战中偶尔用了那么两次罢了。自然，在表面上，党卫军的理想主义矛头是指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如同中古时代十字军的矛头是指向伊斯兰教一样，但是就终极目标而言，两者都是为了领土征服。希特勒对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赞扬斯大林的“天才”，承认搞专制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竞争者，公开表示宁要共产党人，不要王公贵族；宁要西班牙的赤色分子，不要法兰西叛国的法西斯分子。他真正仇恨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俄国人，而俄国人真正的罪过也不是他们的学说，而是他们占据了德国垂涎三尺的“生存空间”。这种看法并不新鲜。这种区别，即打一场“绅士”战——打击那些人，使他们在“新秩序”下能俯首帖耳，和打一场毁灭性的“意识形态”战——目的是要夺取对方的土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早在人所共知的三千多年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存在了。那时，十字军也同样是把理想主义与野蛮残暴两种精神结合（实际上是生硬地并列）在一起的。摩西在论及西奈（半岛）时训诫道：条件应当跟“那些遥远的城市去谈，跟那些不属于这些国家的城市去谈。至于这些国家的城市，上帝赋予汝等以继承权，汝等不必留下任何会呼吸之生物，而应尽量毁灭之……，盖因汝等于上帝而言乃圣洁之民族，上帝择汝作为特殊民族高踞一切地

上人类之上。”

因此对俄国的战争就不同于对英国之战，不同于对法国，更不同于对美国之战，背后不仅是一纸宣战书，还有计划、纲领和政策，而且还有哲学。希特勒此人尽管粗野、半生不透和傲慢无礼，但他总还算是个“哲学家”。他老爱用专横的态度选一些他自己也未必理解的事实，硬纳入他的极权主义的理论框框，就如同他用无情和暴虐的手段把难对付然而终于被他征服了的国家纳入他的“新秩序”一样。他的哲学植根于分散然而却繁复多样的德意志知识界的土壤之中：这里有来自尼采和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有豪斯霍费的“地理政治论”；还有斯宾格勒愤世嫉俗的史学论——这些是主根；旁及维也纳和巴伐利亚新闻界的民族主义唾余、腓特烈大帝玩世不恭的反教会主义以及各种伪科学教条腐烂发霉的大杂烩。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些经过希特勒粗野的但却是强有力的的大脑，却加工成了可怕的，但又是系统、简明的理论，这套理论从他写《我的奋斗》有记载起，到后来他的“餐桌漫谈”作了最后也是最详尽的说明为止，将近 20 年间始终没有变过。希特勒有些像斯宾格勒，斯氏把历史看成是地质层的叠合，每一层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文化”，层与层之间有一段关键性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旧的世纪、旧的文化逐渐让位给新的世纪、新的文化。有过远古的地中海文化，有过中古时代被挫败了的日耳曼文化，后来又有过文艺复兴后的、由海上强国占统治地位的、邪恶的资本主义文化，现在终于——难道预兆还不够明显么？——这个历史世纪的末日来临了，新的世纪必须取代它。

这个新世纪会是什么样子呢？谁的文化将占统治地位？怎样才能促使它在旧世纪垂死的抽搐中呱呱坠地？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希特勒都早就想好了答案。新世纪将是个“地理政治”世纪，因为征服了空间就能促成旧的海上帝国日薄西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敢于说“保证”

与大英帝国不相干这样的话的理由。不管是谁——地理政治学家就是这么说的——只要他能统治中欧、东欧的大片土地，他就能统治英国。这可能是俄国人，他们人口众多，又在一位极权主义的天才（此人希特勒甚为佩服）的统治下有力地组织了起来，而且他们已经在那儿了。但希特勒却不希望在欧洲称王称霸的是俄国人，他希望能是日耳曼人。于是，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他宣布道：新世纪怎么诞生呢？不是靠经济的自然演变，而要用暴力去促成它的突变，一次征服与殖民化的十字军战争，一次巨人之间的战争，他——这位新世纪的创世主，就能全凭人类的意志力，把看来是无可避免的历史旋转过来，把日耳曼的文化植被到这片新征服的欧亚大陆上。感谢地理政治学家的理论，德国的文化将来要统治这个世界几千年。就是这幅巨大拙劣的幻象鼓舞着希特勒恶魔般的一生。为了追逐这幅海市蜃楼，他发动了革命，重新武装了德国，无情而又狡黠地排除了各种干扰，创立了精锐的、神秘的十字军部队，而现在，到了1941年6月，突然发动了对他来说是最最后的也是唯一与正题息息相关的战争：东进，要决定的不是某些与边界或政府有关的小问题，而是整个人类历史未来的世纪！

我们还要问一下：为什么希特勒把发动这场战争的时间定在那个时候？特别是，为什么英国还没有被征服，他又去向俄国挑衅呢？在此以前，他常常说，他决不会像“1914~1918年期间那些笨蛋那样愚蠢”，竟把德国拖向两线作战，而这次，1941年，他自己却真的这么干了，而且还经过深思熟虑，这是为了什么？我想，回答是，希特勒估计错了。说他估计错了，不是说他关于俄国估计错了，对俄国的入侵是按预定计划进行的。他的错误估计是在英国这方面，所以实际上他的错误不是1941年犯的，而是早在1939年就犯下了。

对于希特勒来说，发动对俄战争，实现伟大的十字军东征梦想是他

政策的最高理想，这使他有些想得入了迷。对西欧他又过于大意，又是低估了，又不去了解，这样，何日发动东征就是个极关紧要的问题。他深信只有他才能扭转历史的进程，实现“巨大的任务，即一个人一手创立帝国”。他决定，对俄战争必须快快发动，应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在某个街角上的意外或暗杀发生之前——也许哪个“傻子”带着炸弹正等在那儿——就发动，否则，一次意外或暗杀就能把他从控制的地位上扳下来，千年帝国的远景可能毁于一旦！此外，加快发动对苏战争还有别的原因——还有财政与人口方面的原因。庞大的德国军队开支巨大，要维持下去颇不容易；拖延下去，武器也将过时；纳粹运动面临老化，领导人年事已高；出生率在下降等等。另一方面，俄国人口却在增长，俄国工业也在扩展，在5~10年内，俄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几个世纪之内都将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希特勒在1937年就宣布“我们一定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元首还活着，那么这就是他不可改变的決定：最迟到1943~1945年间要解决德国人生存空间的问题……，到那时候如果还不解决，我们就只能指望情况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如果希特勒仅仅是盘算如何同西方打仗（西方在他眼里已经是江河日下了），那就用不着这么匆忙，用不着制定这么一张紧张的时间表。正是为了对东方的战争，他才定下了固定的、不可更动的时刻，而且决不再等待。

对希特勒来说，不幸的是，东线与西线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截然分开的。说说是容易的：西线战争是与目的无关的，次要的，可以等等再说。但要是西方大国不肯等呢？希特勒要进攻俄国势必先要越过东欧几个小国，也就是法国的庇护国。由于地理方面铁的法则，希特勒必须先打下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才能攻打俄国，法国、英国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呢？从1938到1939年，希特勒曾经全力以赴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

慕尼黑，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但英国人的立场还是难以捉摸。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的盟友——诚然是完蛋了；但波兰现在可是得到过英国保证的呀。尽管如此，1939年希特勒还是下决心不再等待了。他想：总的说来，情况还是好的，“但是这种好的形势再过两三年也会变的，谁知道我会再活多久？所以现在就打比较好。”希特勒并不（可他说过多次）指望英国保持中立，他不会像里宾特洛甫那样自欺自。1939年5月他宣布：“元首怀疑和英国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我们应当为打仗作准备……，英国人是反对德国的急先锋。”他心情阴郁地列举了英国人民的力量，说他们是一个“自豪、勇敢、顽强，在抗击中坚定，在组织上有天才”的民族，爱好冒险，习惯于炫耀武力，财力雄厚，又有“强大的海军和英勇的空军”保护。自然，他**希望**英国人保持中立，因为要是英国人被吓得中立了，通向东方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要是英国不买账，在波兰问题上硬要过不去，那就来他个来者不拒，将英国连同法国一道迅速打跨，东进的基本时间表未必便被打破，到那时回师向东，俄国人仍旧逃脱不了短期内被征服的命运。其时，为时也不会太晚。1939年9月希特勒甘冒的就是这个风险。他一举冲进波兰，压西方表态：打或是不打。

其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西方宣了战。因之在打下波兰后，希特勒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打败英法，尽快使他们屈膝求和，然后掉头回师，因为东方已在召唤：俄国人已经开进东波；敲打着芬兰的大门；并且正在吞并波罗的海几个小国。希特勒很快就将法国打垮，但英国却打不垮。从海上也好，从空中也好，这个顽固的海岛始终无法征服，又不肯和解。希特勒试过用武力，用威胁，甚至用贿赂，都没用。他提出过讲和条件；他声言要夷为平地，统统没有用。他又试着直接打入地中海；试着利用西班牙，在它面前晃动着直布罗陀海峡；他又试着把下一个牺牲者先充

当同谋犯，在俄国人眼前晃动着印度这块富饶的诱饵；他又想利用日本人，把东方的直布罗陀——新加坡捧到他们的面前，甚至向日本人献上妙计：“元首——这位当代公认的最伟大的战略家，”里宾特洛甫通知说，“愿向日本提供进攻新加坡的最好策略。”可这一切也统统没有用，无论是西班牙人也好，俄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谁都没有领他的情，英国还是屹立未动，但是东线的战役却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从1940年8月起，德军总参谋部已开始制订进攻计划，希特勒决不再等了、面对那个难以征服的岛国，他听得见背后时间带翼战军飞驰而近的声音，宝贵的时间在消逝，按当时那个速度，一定要等到征服了英国才动手，那就为时晚矣。温斯顿·邱吉尔不是说过：英国要一直打下去，“可能再打几个月，也可能再打好几年”吗？希特勒该怎么办呢？

他只有一个办法：就当作英国已经被征服了那样去干。毕竟，以德国军队的强大，仍不足以打到英国，那么反过来，在大陆上遭到败北、被打得弃甲丢盔的英国军队要想很快再打回大陆，构成对德军的威胁，也同样的不可能。所以在1940年击败英国的企图受挫以后，希特勒感到按原计划进行仍很笃定，不会有实际的两线作战，因为西线战事已趋于消极，而且还会继续消极一个长时期。在这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伟大的征俄十字军战争已经发动，征服欧亚大陆有可能已经完成了。在那之后，英国肯定会认识到再抵抗下去已没有意义，不相干的西线战争就可结束。毕竟，希特勒并不想从英国得到些什么，他情愿给予慷慨的议降条件，1942年8月间他声言：“如果英国人明天上我这儿来，在各自负担本国军费的基础上向我倡议讲和，我很可能会同意……。”征服东方会给德国带来一切需要的东西，他一生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打败西方，有所得可能会给我们的财产增加几分魅力……，可是征服了东方就能增加无限宝贵的东西，因为那里是我们生存的基础。”这就是希

特勒实际上的想法。他情愿让结束不了的对英战争拖着不结束，也决不让不能推迟的对俄战争再向后推迟。于是在 1940 年 11 月 12 日 — 也就是在柏林接见莫洛托夫，用模棱两可的话麻痹他的那一天 — 他下令“继续按口头已下达的命令作东进准备。”“巴巴罗萨计划”，十字军东征，即将开始。

这个伟大的政策一经决定，剩下的就是细节安排的问题了。一个细节问题是日期问题。希特勒原来打算于 5 月 15 日发动攻击，但是这时却有一件不走运的意外事件插了进来。对墨索里尼来说，希特勒的征服俄国计划他自然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只想在大英帝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中捡点垃圾，并能在巴尔干取得宗主权。“巴巴罗萨计划”虽是瞒着他的，但他对德国在巴尔干进行心狠手辣的几招，还是感到愤愤然的。其实那几招也是“巴巴罗萨”的准备步骤。他决定向希特勒闹点独立性报复他一下。他对自己的外相齐亚诺说：“希特勒老是用既成事实来强加于我，这回我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将从报上看到我已经占领希腊了。”不幸的是，希特勒后来发现的不是墨索里尼已经占领了希腊，而是他遭到了希腊人的痛击，整个巴尔干半岛，希特勒原以为作为“巴巴罗萨”的必要准备工作部分已经得到妥当解决，现在则到处燃起了熊熊大火。更糟的是，西线的敌人英国自敦刻尔克一役被逐出大陆后，现在就有可能经过（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悄悄爬回来。希特勒已经来不及多费时间责骂墨索里尼，现在最紧要的是迅速扫清这里的战场，在刻薄地训斥了“领袖”几句之后（墨索里尼垂头丧气地说：“他拍打着我的手指头说话”），元首就自己把巴尔干战事揽下来了。南斯拉夫的保罗王子被叫到柏林，用分给来自无辜邻居的战利品作为饵食收买了他。后来南斯拉夫背叛了这份声名很臭的条约，德国就残酷地惩罚了他们，英国人被赶出了希腊。当巴尔干半岛恢复了坟墓般的和平时，墨索里尼真正

得到了报复，就像他试图回敬希特勒一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早晨三点钟他被叫醒，一封来自希特勒的长信通知他，德国人已经入侵俄国了。巴尔干的插曲只是把对俄战争朝后推迟了几星期而已，再没有别的。一年以后，希特勒回顾去年，庆幸自己对俄战争发动得这么快。“斯大林，”他用掩盖不住的又羡又妒的口气骂道：“是半个野兽，半个巨人……，要是再让他平安无事地干十年，欧洲就会被他一扫而光，如同匈奴人西侵那样……。”

就这样，德国军队滚滚而来，侵入俄国。德国所向披靡，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仓皇撤退的首都、无比富饶的乌克兰——统统成了战场。紧接着德国大军之后来了党卫军：战士后面跟着教士。这批“新秩序”的宣扬者，一手拿火把，一手拿着他们的圣经，举行令人毛发悚然的宗教仪式。“战区之内”，希特勒下命令道：“帝国元首的党卫军代表元首负有特殊使命为政治治理进行准备，这是一项在敌对制度间进行斗争所必须解决的使命。在实施这项使命的范围内，帝国党卫军可以独立行事，只对元首个人负责。”在德国军队和党卫军的后面，在他起先设在东普鲁士，后来进驻到乌克兰的东线总部内，那位等待这一天等了20年的预言家和战争贩子踌躇满志地在规划着如何实现他的美梦。他深信，入冬以前，俄国东部将落入他的手中，接下去就要开始庞大的殖民计划。想到得意之处，他喝了一杯茶，吃了几块饼，又把“新秩序”的纲要重新理了一遍。这个“新秩序”，现在终于可以作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基础，千秋万代沿袭下去了。当地的土著人将只让他们干些伐木提水的粗活，只有德国**统治民族**才是这个国家一切资源的唯一所有者，才能自豪地“声称自己生来就被赋予这样广袤的空间”，将以无可争辩的、不辩自明的主人翁姿态实施统治。只有他们才能控制战略城市和要塞，交通要道和工厂。宽阔的新式高速公路是一定

得铺设的，大的厂矿资财一定得拿到手。匍伏于德国人脚下的是一些可怜的本地土著，没有武装，没有文化，教他们几个德文字，会认认路牌，看得懂命令，晓得柏林是世界的首都就够了。还得教教他们怎么避孕，好降低他们的出生率；也不能让他们住医院或给他们打预防针，那样就会死得少。这样一来，没有竞争本领，没有抵抗力，人口注定会逐步减少，就能为他们日耳曼老爷们提供一支饥饿的、恭顺的、散漫的斯拉夫农奴，使他们的财富日益增多，“文化”越来越发扬光大。这样，新的德意志帝国就将是一个自控自足的大陆，“一座攻不破的要塞，谁也不能拿封锁来威胁它”。闭关自守可以挡住外来进攻；专制独裁能够镇压内部反抗，于是它就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如同一座堡垒”，怎么会不是绵亘千年，福泽久永呢？

多么可怕的太平盛世！它能够建立起来吗？不难断定办不到。俄罗斯广袤的草原、庞大的人口就是被征服了，也会将征服者同化过去。残暴与宣教阶段，随着环境的改变毕竟也会过去的。古代的以色列人实际是在迦南人中定居了下来。时间会软化暴政，人不能老靠盲从的狂热过日子。而那“坚如磐石”的统治阶级也会在远远不到千年的时间内分化成众多的党、裂变为数不清的派。另一方面，现在的纳粹也不再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初期的纳粹主义——那时可以不负责任地搞暴行，掌权以后也不得不老成一些了，这不就是旧的德国在同化和驯服新的德国吗？我们不是过于自信地说希特勒的“新秩序”就一定不能在欧洲实现，我们能说的是，它终于没有实现。希特勒把俄国的力量估计错了。自信能在几个月之内“消灭”俄国的军队及其政府，希特勒甚至没有准备打冬季战役。他的军队在俄国的大雪里经历过四个冬天。第一个冬天刚过，他告诉戈培尔说，他决不想再见到俄国的大雪了，“他肉体上对此反感之极。”又有一回，他说道：“鲍曼，你知道我一向是最讨厌下

雪的了，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一种预感。”像拿破仑一样，他将要把俄国的大雪看个够。同时，当他的军队年复一年在可怕的俄国荒原上苦斗的时候，不相干的西方正准备在他的后方打回大陆。希特勒曾经打算用速战速决来避开两线作战的局面，现在是躲也躲不开了，他失败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虽然如此，虽然他的估计错误在于西方，但他并不准备败在西方手里；他必须垮台，但他情愿垮在与东方的殊死恶斗中。在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恨德国没有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取胜，因而对德国实行着自我惩罚。他轻蔑地骂道：“德国人被证明是弱者，未来是属于那个强大的**东方**国家的。”新世纪也好，历史的第四时期也好，地理政治时间也好，说到底是属于俄国的，不是属于德国人的。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当希特勒自杀身亡以后，有不少人认为，他的入侵俄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们说：如果他在西线得胜后就感到知足了，他怎么还会被谁打败呢？他只需要坐等英国被无尽止的空战搞到精疲力尽就行了。英国军队就是在最满员、装备最佳、训练最好的状况下，又怎么可能从希特勒那么多师团（都是在东线消耗掉了）手里夺回欧洲呢？于是就能订城下之盟；他也可以抛开意大利，让英国人在地中海上去称雄，对待法国就像俾斯麦在 1870 年那样去对待它，再拿走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夺走西部波兰，置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于卵翼之下，变摩洛哥为经济租界，视巴尔干如经济保护国，这样，他就将不仅恢复，而且扩大了霍亨索伦皇朝的版图。是什么使得他变得那样愚蠢，是什么冲昏了他的头脑，又是什么使得他那样**傲岸自大**，舍此黄金般的机会不图，却去追逐东方的海市蜃楼幻景？这番议论，看来颇似有理，但衡诸历史，我看它就忘了最致命的一点：谈希特勒却不像希特勒。

对于希特勒这个人，如果我通过阅读一些著作对他性格与历史的了

解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征服者与拿破仑是不同的。拿破仑的目标是想在西欧建立帝国，对俄开战根本违背了他的本意；希特勒也不是如同德意志王公贵族、军队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想恢复霍亨索伦皇朝（这个皇朝，他一想到就看不起），那是普鲁士人和保守派按照俾斯麦的传统路线所打的主意。希特勒则既不是一个普鲁士人，也不是一个保守派，他是德国南方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个革命党人，他的思想其来有自，可以在德国的历史中找到甚深的根源，不过现在它们的特性与表现都与过去大不相同罢了。这种不同他自己也很为了解，他说道：“上个世纪统一了德国，这是普鲁士人的任务；现在的任务是建立大德意志并使之成为世界大国，这就要求有一位来自德国南方的领袖了。”要设想他会运用他的革命天才、他的革命政党、他的革命力量去重建霍亨索伦皇朝——一个特性、政治结构和古代疆界他都十分鄙薄的帝国，那是完全白费心机，在我看来，如同想要叫埃塞俄比亚人换上一张白皮肤，或想叫豹子没有斑点一样，都是根本办不到的。希特勒离不开希特勒主义，而希特勒主义则不是征服英国，不是征服法国，甚至也不是西方的外交产物波兰，**而是征服俄国**。对希特勒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打俄国，而是何时打和怎么打的问题，特别是怎样不事声张地打，因为背后还有敌对的西方。他在最后的遗言中说他从不希望与西方打仗，他向军人附言告别说，军队未来的任务仍然必须是“为德国人民在东方赢得领土”——这些话，对照实际，倒也并没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